

范仲淹传

李涵 刘经华 著

先天下之忧
而乐
后天下之乐
而乐

中州古籍出版社

范仲淹传

李涵 刘经华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范仲淹传

李 涵 刘经华著

责任编辑：卢海山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农业路73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焦作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7.125印张 166千字

1991年2月第1版

1991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300册

ISBN 7—5348—0274—1 / K · 52 定价：3.20元

前 言

一九四六年我在燕京大学历史系所写的毕业论文《范仲淹传》，是我的指导老师聂崇歧先生给出的题目，从此和这个历史人物结下了缘分。一九八一年，和我的学生沈学明同志合作，为中华书局编辑的《中国历史小丛书》撰写了《范仲淹》的小册子。一九八二年，指导杨果同志写作她的本科毕业论文《作为教育家的范仲淹》，我自己则写了《论范仲淹在御夏战争中的贡献》一文。总之，对于这个人物的了解越多越深，就越增加了对他的敬意和好感，他虽然是十一世纪的一位古人，但从他的诗文书信中所流露出来的思想感情，仍然是有血有肉，活生生的，使人读起来十分亲切，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和感染力。觉得对这个人物从更多的方面，更深的层次进行挖掘，以便能更真实地反映他的全貌。《范仲淹》的小册子，篇幅有限，许多问题无法充分展开论述。因此从一九八二年起我就有写作一部更为详尽的范仲淹传记的愿望，但被其他事情牵扯着，迟迟未能动笔。此后的几年间，我和刘经华同志在阅读搜集史料的同时，一直注意了解国内外与此有关的研究成果，从早期出版的专著、论文，直到近两年的作品，如一九八六年出版的程应镠先生的《范仲淹新传》，一九八七年出版的陈荣照先生的《范仲淹研究》，凡是能够看到的，我们都认真地阅读和比较，从中得到不少启发和教益，采用了其中若干有价值的论点和精辟的分析，也学习了一些好的写作

的方法。同时也保持了我们自己的一些看法和作法，例如，写历史人物，不能把他看作孤立的个人，而应该写他与同时代人物的关系。这个原则我们是完全赞同的，但在具体处理上，我们又是围绕着重要政治事件来进行的，如写景祐党争时，我们不能不写他的对立面吕夷简，他的支持者欧阳修、尹洙、蔡襄等。但是为了突出重点，对于范仲淹一般的社会交往，亲友关系，我们则大体上从略了。在写法上我们采取了夹叙夹议的方法。在叙事的过程中发表我们对于某些人物与事件的评论。酝酿时间虽长，但写作时间却较短，从去年夏天开始动笔，我和经华(他既是我的学生也是我的朋友)边讨论、边写作、边修改，直到今年六月脱稿，前后不过一年的时间。由于思想水平和学术功力的限制，再加上时间的匆促，粗疏错误，在所难免。所谓多方面深层次地探讨，实际上也只能是相对而言，未能完全做到，如对范仲淹在文学方面的革新主张与实践，在书中就未加论述。学术上的探讨是没有止境的，这本小书譬如登泰山的一级石阶，就让它作为后来攀登者的踏脚石吧。

宋代处于我国封建社会后期继续发展的阶段。经过唐中叶封建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给生产力留有充分发展的余地，因而无论是农业、手工业的生产，还是商品经济的发达，都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显著进步。在社会经济和阶级结构变化的基础上，思想文化方面也要求有摆脱前代陈规陋习能充分体现自己时代风貌的新东西，如在儒学上，反对汉唐以来治经限于章句训诂之学的旧学风，提倡以经世致用为目的，着重探讨儒家经典义理的新儒学，即以宋学代替汉学；文风上批判五代那种专门追求华词丽藻、内容空虚、无病呻吟，“因人之尚，忘己之实”的浮靡之风，提倡写作韩愈式的古文，也即用明白朴素的散文代替过去的骈体文；士

风上纠正五代以来不讲廉耻的颓风，大力提倡气节操守，开士大夫敢言直谏之风。上述学风、文风与士风上推陈出新的显著变化，都发生在北宋中期，而仁宗朝成为一个分界线。这个期间知识分子的思想特别活跃，富有创新精神，他们在哲学、史学、文学等许多方面都取得了光辉的成就，开辟了新的蹊径，对后代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这种时代潮流的激荡中，范仲淹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开拓者和倡导者。而他一生不遗余力地兴办州郡学校，推广教育，奖掖人才，与学术界、教育界的广泛联系，更扩大了他在士子中的影响和作用。

范仲淹生活的时代，又处在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宋初为加强中央集权所实行的强干弱支政策和压抑武人政策所造成的边备不修和地方空虚的弊病，在西夏发动战争以后已暴露无遗，而地方吏治的腐败更达到令人担心的地步。从青年时代起就“慨然有志于天下”的范仲淹，每遇国家危难之际，他总是挺身而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在举目风沙荒凉穷苦的陕西边塞，他和广大将士一起艰苦奋战了三年多，经过在前线的大量调查研究，制定并推行了一条符合实际的战略方针，终于挡住了西夏进犯的兵锋，使宋朝西北边陲转危为安。接着，他又以更大的勇气，和他的同道者一起，领导了一场整顿宋朝官僚政治的改革运动，即历史上有名的庆历新政。虽然由于种种原因，改革很快地失败了。但改革派所面临的问题，他们提出的改革方案，他们失败的原因和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还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

范仲淹影响后世最大的地方，并不在于他政治上的建树和功绩，而在于他的操持上风，也即是对民族精神的振奋。他所提出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代表着当时优秀的士大夫的一种共同的抱负，他们是从庄田地主中涌现出来的先

进知识分子。当时土地转换频繁，地主阶级内部的升降加速，中小地主数目增多了。在科举制发达的条件下，地主阶级的下层，一些寒士可以通过科第而参加政府，取得在政治上的发言权，其中仕途顺利者，并可望致身高位，施展抱负。这种政治上的优越地位，大大鼓励了士人从政的积极性，增强了他们的责任感。由此养成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宏大气象，同时也培育了一种深沉博大的忧患意识，“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种强烈关心国家兴亡，把挽救危难，振兴民族视作自己不可推御的责任，这是在宋代士大夫中萌发出来的一种时代精神，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所独有的，而是早已蕴藏在同时代人心中的一种时代使命感，由范仲淹率先呼唤出来，因而取得了登高一呼，四方景从的效果。正如《宋史》本传所说“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他的召唤之所以感人，是因为他自己一生立身行事的确是把天下的忧乐放在第一位，而不计较一身的利害得失。“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表现出一位政治家的伟大宽阔的胸襟，和为国为民的炽热的心。从他的这种精神中受到鼓舞激励的绝不限于宋人，九百多年来多少仁人志士从中汲取了很大的力量，如戊戌变法维新中献身的刘光第在少年时就表示要效法范仲淹^①。我国的一些无产阶级革命家也爱背诵他的这两句名言。作为封建时代的政治家，范仲淹当然有很大的局限，但是他这种先忧后乐的精神，却代表着我国士大夫的优秀传统，是封建文化遗产中的精华，可以超越时代的限制，成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中的养料。在今天

^①见《自流井》1985年第一期《君子遗风应犹在——刘光第二三事》。

进行改革、开放、振兴中华的大潮流中，不是更需要提倡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献身精神吗？假如本书在这方面能多少发挥一点作用，算是达到我们写作此书的目的了。

在本书即将问世的时候，我首先要感谢先师聂崇歧先生对我的启蒙和诱导，使我踏进了宋史研究的园地。感谢前辈邓广铭先生的鼓励并惠赠他珍藏的范仲淹画像照片。本书在写作过程中还得到王曾瑜、许汉忠同志无私地支持和鼓励，特别遗憾的是老友汉忠未及见到此书，就在今年六月二十五日突然逝世了。中州古籍出版社的编辑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出版给予很大的支持与帮助。洛阳古墓博物馆的黄明兰同志代为拍摄了范仲淹墓地与祠堂的照片，王克陵、高申东同志为本书绘制了地图。对于一切帮助过我们的师友们、同志们，统在此表示衷心地感谢。

李 涵于武昌珞珈山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四日

目 录

第一章	范仲淹的身世、求学与早年从政经历	
一	养育在朱家的孤儿	(2)
二	“读天下书，知天下事”	(5)
三	历经州县，兴利除弊	(12)
第二章	敢言极谏的直臣	
一	请皇太后还政，首次被贬	(25)
二	废后风波，再次被贬	(39)
三	范吕党争，三次被贬	(51)
第三章	抵御西夏的帅才	
一	西夏的兴起、建国与宋夏开衅	(69)
二	御夏战略的争论	(76)
三	西陲形势的好转与宋夏议和	(93)
第四章	锐意革新的政治家	
一	危机四伏的宋王朝	(111)
二	奉调回京，入参大政	(118)
三	庆历新政的纲领	(127)
四	庆历新政的推行、失败及影响	(141)
五	最后的十年	(164)
第五章	“一世之师”	
一	大力兴学，始终不渝	(178)

二 识才、爱才与用才 (190)

三 砥砺名节，开风气之先 (197)

范仲淹生平大事年表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一章 范仲淹的身世、求学与 早年从政经历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

巍然耸立在岳阳古城西门城头的岳阳楼，下瞰洞庭，碧波万顷，遥对君山，气象万千，好一派“巴陵胜状”。

唐代宗大历三年（768年）正月，诗人杜甫携家出川，同年暮冬，乘一叶孤舟漂泊到岳阳。当时，他已五十七岁，穷愁潦倒，病痛缠身。这位一生坎坷，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冲击和动乱的老人，当他登上这座向往已久的名楼，凭栏远眺时，“八百里洞庭”烟波浩渺，横无际涯的壮阔景象，使诗人百感交集，既感叹自己落寞凄苦的境遇，想到西北吐蕃入侵，烽火又起，国土不宁，又为国家人民的前途担忧，禁不住潸然涕出泪下，写出了感人至深的诗篇：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登岳阳楼》①

①《杜少陵集详注》卷22《登岳阳楼》。

这是一个以饥寒之身而怀济世之心，处穷迫之境而无厌世之想的人，在垂暮之年，因感念天地的博大永恒和人生的短促有限，对一往情深的多难的人民发出来的深沉的慨叹！

二百六十八年后，即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年），一位和当年杜甫年龄约略相同的长者^①，在邓州（今河南邓县）花洲书院内，欣然挥毫，为当时修葺一新的岳阳楼题记。这篇脍炙人口的《岳阳楼记》^②，将杜甫《登岳阳楼》的忧国忧民的情感升华到一个更高的境界。其中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句，更是作者在三十年来屡经宦海风波后发自内心的呼唤！它集中展现了那个时代有志于天下的知识分子的坦荡的襟怀和强烈的责任感，成了给后人以极大激励的千古绝唱。

这篇题记的撰写者，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范仲淹。

一、养育在朱家的孤儿

范仲淹，字希文。北宋太宗端拱二年八月丁丑，诞生在淮北大城徐州。照公历推算，应是公元989年10月1日^③。

①《范文正公集》（吴郡义庄藏板。以下简称《范集》）卷7《岳阳楼记》文末“时六年九月十五日”字样，按庆历六年（1046年）时范仲淹五十八岁。

②同上书《岳阳楼记》。

③《范集》附《范文正公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云仲淹生于“端拱二年己丑八月癸酉二日丁丑”。查《二十史朔闰表》丁丑为阴历八月二十九日，此云二日，疑有脱文，姑以丁丑为准，推算公历。

关于范氏家族，虽然范仲淹的后人自谓“昔吾范氏，始于陶唐”，是唐尧的一支后裔，毕竟是远古之事，渺不可考，恐怕只是传说而已。较为可信的记载，见富弼所撰《墓志铭》。称他的先世始居河内（今河南沁阳一带），后徙长安^①。远祖范履冰，曾为唐丞相鸾台凤阁平章事^②。他的四世祖范隋，在唐懿宗咸通二年（861年）任幽州良乡（今河北房山县）主簿，后迁处州丽水（今属浙江）县丞，因此举家南渡长江。唐末“中原战乱不克归”，从范隋以后，这一支便在苏州吴县定居，“子孙遂为中吴人”^③，有祖茔在苏州西部、太湖之滨的天平山。范仲淹晚年出知杭州，路过姑苏老家，与乡里族人搜寻所藏诰书家集，续写家谱，整理出自范隋而下，渡江后的谱系^④。

五代时期，范氏数代在吴越国做官。吴越为唐末镇海、镇东节度使钱镠所建，都杭州，据有两浙苏南十三州之地，这里未经兵燹，在十国中算是较安定的地方。范仲淹的曾祖父范梦龄任吴越国的苏州粮料判官，以德才闻名于时。祖父范赞时，自幼聪颖，曾举“神童”，后任吴越国的秘书监，掌管王室图籍，曾经汇辑春秋及历朝史，写成《资谈录》六十卷刊行于世^⑤。他的父亲范墉，自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年）从钱淑归宋后，历任成

①见《范集》附《褒贤集》卷1《邦瑞等祭墓文》，富弼撰《墓志铭》。

②见《年谱》，又《范集》卷1《岁寒堂》诗亦云：“我先本唐相，弈世天衢行，子孙四方志，有家在江城。”

③《年谱》。

④《范集》补编卷1《续家谱序》云：“至仲淹窃蒙国恩，皇中来守钱塘，遂过姑苏，与亲族会，追思祖宗，既失前谱未获，复惧后来昭穆不明，乃于族中索所藏诰谱，家集考之，自丽水府君（指范隋）而下，四代祖考及今子孙支脉尽在。”

⑤富弼撰《墓志铭》。

德、成信、武宁军节度掌书记，也不过是掌管书牍奏记的幕僚官。尽管他“博学善属文”^①，但是比起曾经贵为宰辅、显赫一时的祖先来，就显得相对逊色了。所以，每当范仲淹提起他早年的家世，总是说自己“起家孤平”，世守寒素^②。

范墉原配陈氏，继室谢氏，范仲淹就是谢夫人所生。不幸，当他刚两岁时，父亲便病故了。家道中衰，谢氏贫无所依，只得带着尚在襁褓之中的范仲淹改嫁给淄州长山县（今山东邹平县东）的朱文翰。据说朱文翰于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曾任淄州长史^③，也是一位知书达礼之人，对范仲淹有养育之恩。从此范仲淹改姓朱，名说，在朱家长大成人。

范仲淹从小就怀着远大的政治抱负，宋史《本传》说他“少有志操”，欧阳修也赞誉他“少有大节”^④，可惜有关他少年时代的情况，并没有留下充分的资料，后人为他撰写的年谱，在他二十岁前也几乎是一片空白。迄今我们所能确切知道的，大都是范仲淹二十岁以后的事情了。有人说朱文翰曾任澧州安乡（今湖南安乡）知县，范仲淹和母亲随往，就读于“老氏之室”，寒暑不倦，学成而仕^⑤。又说他还随继父到过池州青阳县（今安徽青阳），距青阳十五里，有座山叫长山，是范仲淹幼时读书的地方，后人纪念他，将此山改名读山^⑥。这些记载，皆出自南宋人之手笔，与北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年）韩泽所作《淄州长山

①富弼撰《墓志铭》。

②《范集》卷15《润州谢上表》。

③《范集》附《褒贤集》卷3《池州范文正公祠堂记》。

④欧阳修《文忠集》卷20《范公神道碑铭》。

⑤《范集》附《褒贤集》卷4《范文正公书堂记》。

⑥《范集》附《遗迹》。

县建范文正公祠堂记》^①内容相左，大约均系后人附会之词，不足为据。

倒是宋人赵善濂《自警篇》的一则传说，也许有助于了解他少年时的志向。范仲淹小时曾在一座祠庙中祷告神灵，他问：“我将来能当宰相吗？”神灵答曰：“不能。”他又问：“不能当宰相，做个良医如何？”在范仲淹看来，“夫不能利泽生民，非大丈夫平生之志也”。居高位，能为民造福的，当是宰相；在民间，能为民造福的，非良医莫属。良相良医，尽管职位高低不同，为天下人造福却是一致的^②。

二、“读天下书，穷天下事”

范仲淹的一生，大半是在真宗、仁宗朝度过的。这期间从景德到宝元以前（1004—1038年）被认为是宋朝的黄金时代。邵伯温在《邵氏闻见录》卷三说，他听长辈们说：

“本朝唯真宗咸平、景德间为盛，时北虏通和，兵革不用，家给人足。以洛中言之，民以车载酒食声乐，游于通衢，谓之棚车鼓笛。仁宗天圣、明道初尚如此，至宝元、康定间，元昊叛，西方用兵，天下稍多事，无复有此风矣。……庆历以后，天下虽复太平，终不若天圣、明道之前也。”

宋朝在太宗时已完成了国内的统一，太宗并举行两次北伐，企图

①《褒贤集》卷3《淄州长山县建范文正公祠堂记》。又《范集》卷1《岁寒堂三题》中仲淹自云：“某少长北地，近还平江。”是他生长在北方的有力证据。

②赵善濂《自警篇》（丛书集成本）208页。

收复后晋割让给契丹的燕云之地，均遭失败。到真宗景德元年宋和契丹订立了澶渊之盟，两年后又与西夏议和，北方和西北边陲大体安静无事，国内获得一个和平的环境，社会经济向上发展，文教事业受到重视，是被称为太平盛世的时期。但与此同时，宋朝内部的各种矛盾也正在潜滋暗长，兼并势力的抬头和不断加重的赋役，使社会贫富分化加速，阶级矛盾加深了。宋初制定的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策所产生的弊病，已露端倪，官员陆续增多，行政效率却下降；军队膨胀，作战能力却减弱；冗官冗兵带来国家财政开支的扩大；强干弱枝和抑制武人的方针，造成地方空虚、边防废弛的结果。西夏虽然称臣，但其势力正在日益强大，不甘久居人下。宋真宗在澶渊之盟后，不是整军经武，奋发图强，反而大搞什么泰山封禅之类的把戏，又伪造天书降落，表示自己是上天眷顾的真命天子，想借此提高自己的威信，掩盖在订立盟约中的耻辱。直到宝元中，元昊称帝，宋夏战争爆发以后，各种危机才得到充分暴露，惊破了宋朝君臣歌舞升平的美梦，在部分士大夫中产生了要求改革的呼声。宋朝真、仁两朝，特别是仁宗后期正处于由盛转衰的转折时期，处于需要改弦更张挽救危机的时期。也就是在这种不景气的时代，范仲淹登上了政治舞台。公元1022年真宗去世时，范仲淹三十三岁，刚在州县做了几年小官，所以他的政治生涯主要是在仁宗统治期间度过的。

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正当朝廷为“天书”闹得乌烟瘴气时，弱冠之年的范仲淹来到了关中，这时他仍叫朱说。在这里，朱说拜访了当时正闲居长安，被世人称为“有稽阮之风”的王衮，并和王衮的儿子王镒结成好友。王镒家有别墅在长安之南的终南山中，朱说曾兴致勃勃地和王镒，以及周德宝、屈元应两位

道士一起去登游揽胜。这几个擅长文学、喜好音乐的青年，当他们无拘无束，谈笑风生，在青山绿水中流连忘返时，真仿佛置身于仙境。三十七年后，他为王镛作墓表，依然清晰地记得当年头戴小帽，着一身白麻布衣，骑一头小白驴的王镛，和他们一起浩歌吟咏，纵情于山水之间的情景①。

次年，朱说二十一岁，到长白山的醴泉寺去念书。长白山位于山东中部（现名白云山，在今邹平以南），因山中云气长白而得名。醴泉寺在山之北麓，一条清彻的小溪绕山而下，汨汨地从寺旁淌过，这便是后人称作的“范公泉”②。朱说在寺内，经常一个人伴灯苦读，通夜不寐，每到东方欲晓，僧人们都起床了，他才和衣而卧。那时他的生活很艰苦，每天用两升小米熬一锅稠粥，凉了以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两块，拌上一点儿咸盐和非菜末就算是一顿饭。寒来暑往，朱说就这样在醴泉寺苦读了三个春秋③。

朱说在断齑划粥，艰辛苦读的日子里，已“慨然有志于天下”④，决心“读天下书，穷天下事，以为天下之用”⑤，但是这里毕竟太闭塞，“虽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⑥，他渴望着到更广阔的天地里去访师问友，增广见闻，以便将来为国家干出一番事

①《范集》卷14《鄆郊友人王君墓表》。

②同上书附录《遗迹》。

③赵善濂《自警篇》记范仲淹在长白山僧舍读书时“惟煮粟米二升，作粥一器，经宿遂凝，乃划为四块，早晚取两块，断齑十数茎，醴汁半盂，入少盐，暖而啖之，如此者三年。”

④欧阳修《范公神道碑铭》。

⑤《范集》附《褒贤集》卷4《范文正公书堂记》。

⑥同上书卷3《淄州长山县建范公祠堂记》云：“虽刻苦不暇，每患其寡友，一日超然退举，四走方外，求老师巨儒，以成就其业。”